



如是是我見 殷楚紅

十幾年前還未報讀建築學，對這一陌生的學科還沒有實質性理解就時常聽到其如「凝固的音樂」、「藝術和技術的完美融合」。隨後七年多建築學習中，真正實踐的機會並不多，仍以「紙上建築」為主，探討建築設計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多在建築的「藝術性」範疇之內，而對建造本身的「科學性」討論得較少。

畢業之後的工作實踐中我逐漸認識到，狹義的建築設計即針對可使用的空間和可供欣賞的形象的設計和優化，只是龐雜的建築設計工作的一小部分。建築材料、建築結構、建築構造、建造方法等等都是令一個建築從概念設計到落地的重要部分。說起以建築技術而聞名的建築，可能不少人會想到北京奧運會的「鳥巢」國家體育場的複雜鋼結構和表皮，或是悉尼歌劇院懸挑的貝殼形屋頂，抑或是紐約、香港或上海的摩天大樓。這些建築極致展示技術的魅力，但和普通人生活所見所感的日常有些距離。

然而，近年在香港發展勢頭迅猛的「組裝合成



▲MIC的四方庭院。 作者供圖

建築」(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簡稱MIC)則和大眾生活息息相關。自二〇一七年引進這一技術到二〇二〇年提出在辦公室大樓、學校、職員宿舍、護理院等有重複單元的建築中推廣使用，再到現在不斷修正、完善其缺陷和不足，香港

技術的「詩意」

建築業越來越廣泛而深入地運用這一技術。一個個重複單元不似傳統建造方法「先落成，再裝修」，而是「先裝修，後鑲嵌」。一個個預製單元內部的單位間隔、屋宇裝備配置、飾面裝修、衛生潔具，甚至是固定電器都可以預先在工廠做好，到現場只需要用吊裝設備將一個個模塊放在現場做好的結構框架內，提高了施工效率也減少了地盤高空作業發生危險的幾率。聽起來好像兒時「砌積木」一樣簡單的技術設計概念，實際操作過程中會有許多限制，比如模塊和模塊之間的防水防火問題、模塊再利用拆裝過程中的損耗問題、運輸模塊的尺寸限制、超限尺寸模塊運輸的特別交通安排、狹窄地盤吊裝模塊的局限性等等。解決或是優化這些困難的過程又涉及專業協調、材料科技、管理方法甚至是和政府有關部門的溝通和協作。說到這裏，一些建築師或許會覺得這些已經太過技術而和建築設計的工作關聯性太低，雖然我也曾一度這樣認為，直到一個小事件給我很大的觸動和啟發。

在一次參觀內地的MIC廠房的過程中，廠方展

示了單個模塊的建造流程，保證模塊兩兩完美嵌合所做的工作和考量，以及吊裝過程中保證幾個吊裝點受力均勻的滑輪組設計，令我們大開眼界。隨後，我們還參觀了他們的一個混凝土的研發和檢測中心，那是一個偏於廠區一隅的小建築，一層高，是個平平無奇的混凝土盒子，穿過一個辦公空間，一抬頭，是一片淺白的天空，四四方方的小庭院，灰色的混凝土牆上連續的窗洞讓人一眼看「穿」整個建築，淅淅瀝瀝的雨水順着滴水瓦在空中劃過一條條細線，映襯着室內、室外的三三盆栽，工業園區居然也有了一絲禪意，「看似無情卻有情」。後來在師傅的講解下才知道這原來是廠裏生產的一個香港學校班房的樣板模塊，廢棄後他們就拖回廠區將其一分為二，前後拉開從而中間形成一方庭院。聽完內心十分澎湃，原來我們一直以為的冷冰冰的建造技術在巧思下也可以頗具人情味。

如今建築設計狂熱求新求異的大秀場時代一去不復返，建築師重新審視建築學作為橫跨藝術和技術的實踐科學，深入發掘兩者相結合的新方式，令藝術有「道理」，技術有「詩意」。樸素簡約的設計並非意味着單調和乏味，也可盡顯技術和藝術相結合的意趣。

陳垣

一九二七年美國天主教會本篤會，在北京創立輔仁大學，倡議者是《大公報》的創辦人英敏之，英敏之一九二五年創辦了為天主教人員進修中國文史而設的輔仁社，大學之名來源於此。一九二六年英敏之去世，將自己的未竟之業託付陳垣。輔仁大學從創校之日起，直至一九五二年併入北師大，陳垣始終擔任校長。

輔仁大學的國文課，不隸屬中文系，由陳垣校長直接主持，所用教材由校長親自編選，內容多半為先秦歷史名篇，於學生的深造中國文史非常有益。他在家書中說，「教書可以教學相長，教國文尤其可以借此練習國文，於己有益，必有進步。」

一九一九年陳垣由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主持受洗入基督教，由於他長期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常有人誤以為他是天主教徒，也有人誤以為他是回教徒，他著《中國佛教史概論》等佛教史學論著，與佛教業也結下不解之緣，署名自稱圓庵居士，與本字「援庵」同音，他所有宗教史研究文字，對於宗教教義，幾乎從不置評，他與多種宗教的複雜關係，非一語可以盡之。他曾明確說過，「我實為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稱為某某教徒也。」

陳垣是廣東新會人，字援庵，生於一八八〇年，出身於藥商家庭，早年就讀於美國傳教士在廣州創辦的博濟醫學院，接受過現代西化的科學訓練。陳垣治學之初，依據張之洞《書目答問》搜集材料研讀，一九一三年他以議員身份赴北京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此定居北京。一九一七年著《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啟他的史學生涯，對於中國宗教史的研

究，他作出了開拓性貢獻，和陳寅恪並稱「南北二陳」。《元西域人華化考》、《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曆》、《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是他的主要學術著作。

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等人在中國西北輿地、中西交通、漢文宗教、佛教歷史、歷史文獻等方面能夠超越戴震、錢大昕這些乾嘉學派的大師，主要得益於西方漢學家如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研究所帶來的啟發，這些漢學家們真正作出貢獻的領域，其實不是漢學，而是中國人向來忽視的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領域，其基本方法，是首先學習掌握這些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陳垣在研究元史過程中，自學了蒙古文，湯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受益於他的梵文和巴利文。

作為史學界前輩，陳垣在北京生活了近一個甲子，加上此前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地任教授，他培養出大批卓越的史學家，桃李滿天下。鄧廣銘、白壽彝、鄭天挺、韓儒林、方國瑜、史念海、柴德賡、臺靜農、姚從吾、馮承鈞、翁獨健、岑仲勉、周一良、啟功、周祖謨、劉乃和、單士元、蔡尚思、容肇祖等等皆出其門下。其中余澍(余嘉錫之子)、柴德賡、啟功、周祖謨，更被稱為「陳門四翰林」。曾在輔仁授課的名教授不可勝數，以劉盼遂、高步瀛、顧隨廣為今人所知。

在寫給子女的家書中他說，「《孟子》《論語》宜熟讀，文氣自暢；曾讀過之古文，亦宜常溫，此古文也。至於今文，吾極欲汝看一家好論說之報紙。天津有《大公報》，其社論極有法度。」作為一位終身從事教育工作的學問家，他把寫字作文，視作一個人應該並能夠擁有的藝

舟之雙楫。(二十二)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了為天主教人員進修中國文史而設的輔仁社，大學之名來源於此。一九二六年英敏之去世，將自己的未竟之業託付陳垣。輔仁大學從創校之日起，直至一九五二年併入北師大，陳垣始終擔任校長。

輔仁大學的國文課，不隸屬中文系，由陳垣校長直接主持，所用教材由校長親自編選，內容多半為先秦歷史名篇，於學生的深造中國文史非常有益。他在家書中說，「教書可以教學相長，教國文尤其可以借此練習國文，於己有益，必有進步。」

陳垣是廣東新會人，字援庵，生於一八八〇年，出身於藥商家庭，早年就讀於美國傳教士在廣州創辦的博濟醫學院，接受過現代西化的科學訓練。陳垣治學之初，依據張之洞《書目答問》搜集材料研讀，一九一三年他以議員身份赴北京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此定居北京。一九一七年著《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啟他的史學生涯，對於中國宗教史的研



澳門印象 焦惠標

十二月二十日，是澳門回歸紀念日，今年適逢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更添喜慶！港澳一水之遙，也感受到歡樂氣氛！

二十五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算短了。然而，對我來說，實在不算長，二十五年前採訪澳門回歸的情景，歷歷在目，恍如昨天。最感人的一幕，是解放軍駐澳部隊進駐澳門。車隊緩緩前進，市民紛紛走到街上迎接子弟兵，街道兩旁，萬人空巷，掌聲歡呼聲響徹雲霄，士兵精神抖擻地站在車上，向街道兩旁市民行軍禮。當時的情景，令在場者心潮澎湃，久久難以平靜。

二十五年過去，這個情景依然留在我的腦海，是我數十年記者生涯不能磨滅的經歷之一。最近收到朋友送我一本紀念冊《澳門記憶》100精選，再次勾起對往事的點滴回憶。《澳門記憶》100精選原是短視頻，由澳門理工大學中西文化研究所和澳門日報聯合製作，超過一百七十輯，從中挑選一百輯，編輯成紀念冊。全書共二百二十三頁，圖文並茂，以「文化篇」開始，共有八個分類。文字雖然不長，但言簡意賅，而且內容十分全面，涉及面甚廣，除了旅遊景點，例如家喻戶曉的大三巴牌坊、崗頂劇院等等，還有更多的是以前略知一二，沒有深究，閱讀之後增長知識，也加深了對澳門的認識，例如，孫中山「懸壺」譽滿濠江，原來孫先生一八九二年二十六歲在香港醫學畢業後，應鏡湖醫院之邀，來澳主診，是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還有百年功德林、何東圖書館等，紀念冊都有一一介紹。

頗有趣味的是「社區篇」，介紹不少街道名稱的由來，原來十月初五

《澳門記憶》多精彩

——祝賀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



▲澳門大三巴牌坊。

新華社

街竟與葡萄牙人推翻帝制有關。「爹利仙拿姑娘街」，看其名真不知其所以然，原來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一八八八年，澳門先爆發霍亂，繼而鼠疫入侵。爹利仙拿為首一眾修女，挺身而出，幫助社會戰勝疫情，政府以街命名，以茲表彰。至於福隆新街，昔日的煙花之地，如今成了遊客必到的食街。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記憶》內容全面，有不少愛國人士的事跡，例如濠鏡與革命，澳門人的抗戰救亡，反映了澳門同胞的愛國情懷，也有介紹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葡人，羅保博

士街的羅保原來是一位對澳門慈善和教育都有貢獻的葡人。這些功在社會的葡人在書中都有他的篇幅。

《澳門記憶》很有閱讀性，趣味性也強，令人手不釋卷，二百多頁很快讀完。但是，看完之後，掩卷沉思，若有所失，好像缺少了什麼？驟然感覺，是不是欠一章澳門日報？澳門日報歷史悠久，服務澳門社會六十六年，無論澳門回歸前的平穩過渡，還是回歸後的持續發展，其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澳門記憶》是不是可以考慮增加對她的「記憶」？精選101又何妨！



▲崗頂劇院。

新華社

搖籃

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曾說，如果你在街上隨機與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搭話，並要求他們清空背包，你會發現，在無線耳機和盒裝麥芽奶等雜物之中，總會有一本愛爾蘭小說。

這句話固然有誇張成分，但愛爾蘭文學擁有很高知名度卻是不爭的事實。多年來，愛爾蘭作家連續出現在世界著名文學獎的名單上，有至少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五位布克文學獎得主以及各個年齡段的文學巨星，從喬伊斯、貝克特、柯姆托賓到莎莉魯尼等等。尤其在過去的五年，愛爾蘭湧現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堪稱小說的「黃金時代」。那麼這個僅有五百多萬人口的國家，何以在文學方面如此出眾？

愛爾蘭獨特的歷史無疑是重要因素。一方面，早在中世紀黑暗時代，其便處於歐洲的邊緣，這使得愛爾蘭免受歐洲大陸政治和社會動盪的影響，結果是保留下來大量文學遺產，包括許多唯一倖存的作品副本。由此也導致愛爾蘭人的識字率遠比歐洲其他地方高，並且擁有一個由學問和文獻保存中心（如修道院等）組成的完整網絡。作家托馬斯·卡希爾在《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一書中寫道：中世紀早期，愛爾蘭人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幾乎是學者的

代名詞。這些人有關讀能力，而且實際上已經閱讀了大部分古代文學的偉大作品，他們了解世界各地的詩歌和神話等等。以享有高度榮譽的吟遊詩人為例，他們是聽着令人驚嘆的古代故事長大的，這些故事寓教於樂，甚至教授人生的道德規範。因此說故事和詩歌一直是愛爾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在古代愛爾蘭，詩人幾乎與皇室有着同等的社會地位。

另一方面，如作家克里斯多福·莫拉西在《都柏林：作家之城》一書中說，愛爾蘭歷史是一部支離破碎的歷史，正是這種悲愴某種程度上成就了愛爾蘭文學。外界印象最高的，無疑是十九世紀中葉著名的愛爾蘭大饑荒，從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二年間，愛爾蘭有逾百萬人死於飢餓，另有百萬計的人逃離到世界各地。據統計，饑荒最終導致愛爾蘭的人口幾乎減少了近一半，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愛爾蘭的人口才恢復到饑荒前的水平。這個深重的集體創傷，清晰地反映在愛爾蘭現代主義流派之中，作為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藝術運動，吸引了傷痕纍纍的一代愛爾蘭藝術家和作家，他們有着一種強烈的衝動——我們需要讓（愛爾蘭）這個地方煥然一新。如同愛爾蘭詩人和作家葉芝所形容，「愛爾蘭就像一團軟蠟球，準

備重新被塑造」。這給予了愛爾蘭作家們巨大的使命感，尤其對於那些失落的、多災多難的古老過去，他們要在筆下將它們重生，於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將殘酷、抒情、幽默和熱血主題混合在一起，並因此奠定了愛爾蘭文學的豐富性。

正是經歷了如此之多的磨難，愛爾蘭人對自有文化尤為珍視，也塑造了文學的獨特。直到十九世紀，愛爾蘭的大多數人都在講愛爾蘭語（也稱蓋爾語），並保留了強大的口語講故事傳統，包括產生許多精彩的民間傳說。憑藉處女作《侵入》榮獲二〇二二年愛爾蘭圖書獎年度小說獎的作家路易絲·肯尼迪，就將小說事業的成功歸功於愛爾蘭式英語，其特點是語言的兼容並蓄，令文字產生豐富多彩的措辭變化。她解釋說，當愛爾蘭人失去自己的語言時，他們沒有接受正式的英語課程，而是將新單字應用到愛爾蘭語法結構中，這有時會為愛爾蘭人的散文或演講增添一點音樂性。

與此同時，英語在愛爾蘭的迅速普及也造成了一種文學上的不安感，使得愛爾蘭作家們大膽嘗試新的語言寫作風格，呈現出的作品往往獨樹一幟。典型例子是被公認為現代主義傑作的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用英國《書

架》節目主持人凱特·埃文斯的話說，該書仍被視為有史以來最具創新性的英文小說之一，它透露出喬伊斯渴望對新語言進行實驗，並用一種「他完全不熟悉的語言寫作」。

當然，愛爾蘭文學的成功也離不開薪火相傳。就像愛爾蘭作家朱麗葉·梅貝形容，如果你正在考慮成為一名作家，環顧四周，會發現在你之前已有兩三代作家，心裏便會想「我也能做到這一點」，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事實上，作家們也得到愛爾蘭國家層面的支持，包括舉辦眾多文學節和獎金豐厚的文學獎來激勵文學創作，以及小說收入可申請免稅最高五萬歐元等。在此氛圍之下，愛爾蘭出版業蓬勃發展，各類文學雜誌比比皆是。以創刊於一九九七年的著名《刺蠅》為例，便為很多受歡迎的愛爾蘭作家早期職業生涯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他們由此嶄露頭角，並為自己今後登上國際文學獎台鋪平了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愛爾蘭近幾年來重大的社會轉變之一，是向多元文化的轉型，這也助推了文學的繁榮。例如《指甲花戰爭》《鯨魚滾滾》等收穫好評的作品，都反映了愛爾蘭的文化多樣性。如同都柏林三一學院教授克里斯·莫拉什所說，愛爾蘭對文學的偏愛，使其成為作家的搖籃。



英倫漫話 江恆